

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看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

江玲, 周晓丽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科学技术的利用和发展在改善人类生活和加速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以后,引发了各界的讨论和关注。本文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该危机事件的产生以及政府官员、核能专家、救援人员以及普通民众各方的处境与应对。

关键词:风险社会;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科技

The View on Chernobyl Nuclear Acci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ck's Risk Society Theory

Jiang Ling, Zhou Xiaol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211100)

Abstract: While th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and accelerated the social progression, it also brought unpredictable danger to humans. After the shocked Chernobyl accident, its terrible consequences caused a discuss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ck's risk societ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the crisis happened and how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nuclear experts, aid workers and ordinary people.

Keywords: Risk Society; The Chernobyl Nuclear Accident; Nuclear lea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前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的工人正在进行反应炉的自我供电系统测试时,反应炉的中心发生一系列爆炸,溶解的辐射粒子喷向高空。这一事故成为人类和平使用核能历史上的一次最大悲剧,被称之为“灭顶之灾”。核能是一种重要的能源,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新技术。新技术新发明一旦被应用,它带来的风险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制造了技术,也被伴随技术的风险控制着。“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分析该事件以及现代社会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是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路上》一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对风险社会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指出风险的概念与反思现代化直接相关,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风险自古就有,人类历来生活在一个与风险共存的世界中。但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一些独特性质:不可感知性、不确定性、全球性、风险制造者与受害者无区分以及知识依赖和风险具有扩展性。现代社会的风险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也改变了当今社会的运行模式,自此人类从“财富分配的社会”进入到“风险分配的社会”。

“风险分配”、“个体化”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贝克阐述其风险社会理论三个核心概念。首先,贝克分析对比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中两种不同的社会内驱力,在工业社会中人们以财

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阶级地位的表征,而贝克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工业社会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所带来的,像大气污染、河流污染、核污染等都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逐步产生的,因此现代社会的风险是工业社会的后果之一,属于人造风险。但由于技术的精密和高端性,随之带来的新式风险往往会超越人类的感知能力,普通群众可能无法认识到潜藏在自己周边的风险。同时,这种风险没有阶层之分,也没有疆界。苏联核试验的背景之一是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阵营的冷战和军备竞赛。这是人类为了利益之争而追求技术进步的尝试,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只是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技术带来的灾难也是人为的灾难。在这场跨国界的灾难中,没有人能够侥幸避免。这不是某类人或者某个阶层的灾难,而是全人类的灾难。没有了地域的分别,也没有了国界的限制。在工业社会之前,即使是人为引起的灾难,但由于人类的能力有限,影响范围也是有限的,但是现在人类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迅速提高,其带来的灾害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的承载力。人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只能控制事件的发生,但对其结果却无能为力。也许在工业社会或者阶级社会,灾难往往是眷顾那些贫穷的人,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更为有限,因此更容易遭到侵害。相对地,某些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人可以利用金钱等,通过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来规避风险。而进入后现代社会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个阶层,手中掌握多少资源,在面对不期而至的风险时,都是无能为力的。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时,下至黎民百姓,上至高层官员,无一人能逃脱干系。在这样的风险面前,人是平等的。

第二,风险社会中,风险借助于个体化正越来越多地以个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贝克是这样界定个体化的,“人们将从工业的社会模式中——阶级、阶层、家庭、男女的性别身份——解放出来,就像在宗教改革中,人们从教会的世俗统治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一样。”个体化的实质就是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因此风险社会也是个人化的社会。个人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多,风险的可归因范围却越来越狭窄。个人面对强大的社会风险,却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人类是与看不见的敌人进行的殊死较量。因核辐射是不可感知的,而且由于核能知识的高端性和专业性,在核泄漏发生后人们可能无法立刻感受到其危害性,因此不能采取及时的防护措施,预料及避免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第三,贝克尖锐地指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方面风险的制造者以他人作为风险牺牲品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机构也在想法设法掩饰这种风险的存在。贝克借用“亚政治”这一概念洞察政治制度在风险社会中的微妙境地,亚政治是指“处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商业机构总有办法不负责任地规避自身的问题,而公共机构处理风险的方式就是:找来科学家或专业人士,科学家会依循严密的因果论证来证实风险是否存在。不过,在对某一风险定性或是追究责任单位时,标准变得模糊不清,难度往往非常大,最终导致风险的判定几率一再降低。受害人的投诉过程变得尤其艰难,也会对政府公共机构不再信任。毋庸置疑,商业机构和政府公共机构强大的联合拖延了抢救或预防风险的最佳时间。以环境污染问题的鉴定为例,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可能会因为迟迟未获得相关部门的调查取证或是取证过程的艰难复杂而一再耽搁。苏联政府在事故发生后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并未立即向市民发出任何安全警告。随后政府利用自己对知识的掌控严密控制着所有真实的信息,又利用自己的权威进行一套话语论述,通过权威电视新闻媒体将信息传递给民众,只是这种信息是加工过的,不符合事实的。

2 从风险社会理论看切尔诺贝利事故中不同群体

2.1 政府官员

贝克尖锐地指出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态度的社会。爆炸后8小时,戈尔巴乔夫掌握的讯息非常贫乏,只知道发生了火灾,不知事故的严重性。当他们询问专家后也得知一切正常,包括反应炉。而事实是此时反应炉还在燃烧,辐射还在继续扩散。在事故发生一天多后,随着当地核能研究所报告测试了惊人的辐射值后,苏联政府可能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紧急成立政府委员会,希望国内核能顶尖专家能迅速评估状况,所以政府一直处于等待报告的被动状态。天就要塌下来了,但政府方面好像表现的若无其事,并只在报纸的底部小字表示灾难已经过去,而后正常举办五月庆典。灾变发生10天以后,第一次邀请了西方核能专家去到现场勘查事故。官方隐瞒各种数据,可以隐瞒和虚报事故的持续影响和受害人数,至今没有发布关于13万难民及50万清理人的统计数字。

2.2 技术专家

风险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知识依赖。在第二现代中,许多新式的风险已经超越人类感知能力,例如:放射线、食物中的有毒物质等。这样的风险是人们无法透过原始感官来经验到,所以,特别需要倚赖科学知识、各种研究报告,以及大众媒体报导来加以掌握。许多的报告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原本无害的东西,突然间在研究报告中变得有害,并使大众惊恐和不知所

措。由于人们无法第一手感知到这些风险,所以,只能依赖于专家们种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但是,人们对这些知识同样难以加以判断,不安感仍然笼罩心头。事故发生后,戈尔巴乔夫紧急成立由全国核能专家在内的政府委员会。所有重要的信息都是由专家团体提供的。个人对这一领域的陌生导致我们不得不依靠专家团体。这也是第二现代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知识依赖。贝克指出,公共机构处理这类风险的方式必然是找来科学家,由科学家进行论证风险是否存在。实际上,苏联政府确实是这样做的,核物理专家团体的出动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有制度对这些专家的发言权的独立性进行保证。否则,当专家团体成为政府利益的代言人时,人们就会对政府、对专家、对知识产生怀疑,更严重的后果是对社会的制度安排进行反抗。

2.3 救援人员

第一批赶往现场的消防员,以为只是一场火灾,完全不知道其中的情况,在缺乏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与火搏斗,他们都暴露于生命辐射值中,最终几十人丧生。随后的现场清理工作中,还有更多的年轻力壮的军官、士兵和工人在救援过程失去了健康和生命。清理人返乡后有的因辐射致死,有的活下来了但在以后几十年的生命中要受尽辐射的折磨。可恨的是,政府对参与这次拯救行动的贡献者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但政府无视他们的困境未能提供他们持续性的财政支持,减少了他们的福利金,他们处于低保障的状态,独自承担着随时失去生命的风险而无计可施。

2.4 普通民众

普里皮亚季的约43000名居民在爆炸发生后,生活正常进行,他们对仅隔3公里以外的灾变还不知情,只听说城里核电厂发生了火灾。事故后20多小时后随着辐射值持续升高超过人体安全接受值,官方依然未发布任何消息,居民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来降低辐射,所有的居民都被真相蒙蔽。在这样的事故中,普通百姓最为无助,他们根本不清楚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的生命是否收到威胁,也许他们自己或者后代至今还在承受核辐射的恶果。

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制造了风险。正如后现代学者吉登斯在反思现代性的后果时总结,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理性不可分割:一方面人类现代性的发展是人类利用自身理性的结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分裂,使技术理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而价值理性却日渐式微。人类的能力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进步,但是,技术层面的迅速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了无法回避的大麻烦,例如生态环境的恶化、食品药品添加技术的滥用、军事安全的威胁等。

参考文献

- [1]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文,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 赵延东. 解读“风险社会”理论[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6).
- [3]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4] 薛晓源,周战超.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江玲(1990-),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

周晓丽(1988-),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